

我国经济增长的 供需总量驱动特征与阶段性分析

刘金全,曲国俊,马昕田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1)

摘要:经济增长体现在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张上,经济总量的形成需要满足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短边规则”。经济增长的总量驱动效应与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密切相关。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三种基本阶段:供给总量单因素驱动阶段;供给总量和需求总量双因素驱动阶段;总需求成为经济增长关键影响因素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在市场化 and 工业化进程中已完成了上述三个阶段的转变。随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性显著降低和经济增速在高位稳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轮增长型长波的主体已经形成,并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筑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增长;总需求;总供给;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1)03-0044-04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是在显著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实现的。我国经济发展经历的过程和积累的经验,不仅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大现实案例,也为研究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提供了丰富证据。虽然已有很多经济学家对我国的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进行了深入研究,^{[1][2]}但传统经济周期研究仅仅局限于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划分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定阶段的性质分析,而对形成经济增长长波轨迹的体制条件、市场条件和经济均衡条件等缺乏必要的分析。^[3]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多个形态不同的经济周期,经济运行的体制条件和市场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在描述和分析我国30多年来经济增长过程的同时,有必要将经济周期理论

和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具体分析影响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各种决定因素。为此,本文将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彼此制约与短边均衡的角度出发,阐述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总量驱动理论,对比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后三个经济增长阶段的宏观调控模式与经济政策效应,进而揭示我国经济增长长波形成的基础。

一、经济增长的总量驱动理论和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划分

如果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会发现,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无论经济形态和市场条件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仅从经济增长的来源看,持续的经济增长一定要依靠持续的动力。根据现代经济增长

注: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06)的资助。

收稿日期:2011-01-02

作者简介:刘金全(1964-),男,黑龙江密山人,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理论,形成增长驱动力的要素主要有三种: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增长、持续的物质和知识资本累积、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并且这三种要素交互融合、彼此促进,进而形成不同形式的经济增长方式。^[4]由于大多数经济中存在显著的非自愿失业,劳动力供给一般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因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累积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已成为内生和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至于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则是从总供给角度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出发点。显然,这些基于生产要素的经济增长分析方法主要描述经济中生产部门和总供给能力的形成,如果具有与总供给匹配的总需求,则总供给的增长自然能转化为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是通过社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双重因素共同作用实现的,社会产品的供给满足社会需求后,成为了最终使用产品,总消费增加则促使社会福利总量的提高。如果处于供给状态的产品没有社会需求,那么追求社会福利优化的经济个体便不会进行这样的生产,进而导致该类产品生产下降甚至停止,所以供给行为仍然只是国民收入形成的单边行为;同样,如果经济社会仅仅存在对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消费需求,但生产者无法进行相同数量的生产和供给,那么以社会消费水平度量的社会福利状态便不会得以改善和提高。这种总供给和总需求无法达到平衡状态或无法向新的均衡水平调整的情况,仍然无法保证有效率的经济增长的实现。这样一来,经济增长的实现就需要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双重角度进行度量和判断。

从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决定理论到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决定理论,再到货币学派实际需求和名义需求交互决定理论,这些旨在保持经济稳定和快速增长的理论学说都在各种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过大量的实践,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而从中获得的重要启示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仍是描述和判断经济增长趋势的基础。仅就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而言,可将经济增长速度与“自然率水平”进行对比,如果经济增速高于“自然率水平”,则认为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增速接近“自然率水平”,则认为经济处于稳定增长阶段;如果经济增速低于“自然率水平”,

则认为经济处于收缩阶段。^[5]以往经济周期经常被划分为扩张、繁荣、萧条、危机和复苏等多个阶段,但是,由于增长型经济周期中这些周期阶段的分界越来越模糊,所以上述三阶段划分成为经济周期划分的新趋势。如果经济增长的“自然率水平”是适宜的,那么接近“自然率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则是比较稳定的,并且具有一定的抵御外来冲击的稳健性。处于“自然率水平”以下的经济收缩和处于“自然率水平”之上的经济扩张,都具有产生经济波动的倾向。频繁和过度的经济波动是以经济信息不完全、经济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和社会整体福利损失为代价的,所以需要适当的经济政策调控予以干预。

由于经济周期阶段比较短暂,而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需要将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向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进行拓展。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是一个内涵更为宽泛、期限结构更长的时间区域划分和界定,在这样的期限结构内更容易梳理和透析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及作用机理。为了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跨度内勾画出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波态势,本文除了利用市场体制和经济体制等因素外,还将经济增长总量驱动方式即总供给和总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调节机制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标准。根据这样的总量驱动方式进行划分,不仅可将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结合起来,也能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转化结合起来,将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结合起来。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总供给管理为主、总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

我国经济增长可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1978年至1991年、1992年至1996年、1997年至2007年。在1978年至1991年这一阶段,本文称之为“经济增长的总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这一阶段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27%,最高速度为15.2%,最低速度为3.8%,波动率为3.39%。显然,这些指标说明,这一阶段经济波动比较明显,波动幅度为波动率的1.68倍。显著周期波动是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特征。在这一阶段,我国共经历了三个比较完整且性质相同的经济周期。在此期间,经济发展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

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等重要事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促成了此间具有同质性的经济周期。^[6]这一阶段的周期波动模式为:供给不足——需求过剩——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经济周期波动的起点均是以供给短缺为诱因的投资扩张和需求扩张。伴随着市场体制因素和经济制度因素带来的时代变迁,我国经济开始向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短缺宣战,开始向计划经济下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扭曲宣战,开始向束缚人们思想和阻碍开放的传统习惯与势力宣战,从而一举实现了由古典经济周期波动向增长型经济周期波动的转变。这一巨大的经济发展跨越和巨大的经济改革,在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导致剧烈的经济周期波动也属正常。总供给单因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世界经济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必将以总供给能力的有效释放为主要驱动特征,只有实现有效供给的社会扩张,才能有效实现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初期的十余年,我国终于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挣脱了总供给能力的羁绊。

三、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二阶段:总供给管理和总需求管理并重、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

总供给能力的快速形成和总需求能力的突然释放,必然使刚刚处于价格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市场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即快速经济增长中连带出现的高通货膨胀。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到1996年,以经济全面回升为开始,以经济“软着陆”为结束。由于总供给和总需求均处于活跃状态,所以也可称之为“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这一阶段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2.44%,最高速度为14.2%,最低速度为10%,波动率为1.89%,波动幅度为波动率的1.07倍,正态分布假设下这种波动率出现的概率为28.5%。经过对比研究发现,这一阶段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快增速,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持续性也大大增强。这一阶段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双重扩张。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投资乘数作用十分明显,边际消费倾向显著提高,流动性约

束大为降低,这些都有利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宏观经济调控也具有敏感效应。在这种强劲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具有连带效应的双重驱动下,虽然经济中已开始实行紧缩色彩的调控政策,但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由于此间出现了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调控措施,在短短的5年中,直接促使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双双回落到“软着陆”的区域内。通货膨胀减缓了,高速增长停止了,此时人们又开始思考两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经济“软着陆”后下一次经济“起飞”将在何时?下一次经济“起飞”后经济将出现什么样的增长格局?我国经济增长从1997年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周期出现了“峰前无谷”的现象,即前一个周期的尾部成为后一个周期的峰顶,而且后继经济周期分界模糊,没有清晰的谷底出现。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软着陆”是着陆在“自然率水平”之上。于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过程,并促使经济探索出我国“自然增长率”的基本迹象,为后来经济实现具有“软扩张”性质的新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四、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阶段:总需求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阶段

当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人们突然注意到,随着价格水平“安全着陆”的还有很多重要指标:经济增速“软着陆”了、货币供给增速“软着陆”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软着陆”了,人们的各种投资预期和利润预期也同时“软着陆”了。经历了改革开放近20年的剧烈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后,面对悄然而至的轻微通货紧缩和平稳经济运行,人们开始询问:是否经济周期波动也伴随着价格水平稳定而消失了呢?虽然“软着陆”后,我国经济增速仍保持在8%左右,但有效需求不足开始出现,前两个阶段形成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和大量库存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隐患。为此,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具有“顺周期”色彩的需求扩张政策,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以总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轻微通货紧缩、经济平稳增长、买方市场的形成和稳固等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总需求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这一阶段的平均增速为 9.37%, 最高为 11.40%, 最低为 7.60%, 经济波动率为 1.30%, 说明该阶段的经济波动性降低, 波动幅度仅为波动率的 1.46 倍, 体现出经济进入需求管理阶段所具有的典型特征, 即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的惰性和稳定性。在该阶段初期, 便发出了明确的扩张信号。这主要源于我国经济出现了两个现象: 一是大家比较陌生的通货紧缩现象。此时, 投资利润预期下挫, 价格水平持续轻微下落, 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放缓。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组合。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 主要以举债的方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稳健的货币政策方面, 主要目标是保持名义经济需求与实际经济需求的基本同步。因为货币需求的扩张既需要中央银行源头的松动, 也需要消费者的货币持有和货币需求的提高, 否则货币会因流动速度降低或储蓄回收而无法发挥刺激总需求的作用。同时, 我国当期货币政策操作并没有旨在诱发适度通货膨胀的动因, 这与日本曾一度实施的经济货币政策的企图明显不同。^[7] 与前两个经济增长阶段相比, 这一阶段具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征。一是经济中出现了较低的价格水平和持续的轻微通货紧缩, 并且难以形成稳定的投资、消费和利润预期。当面临总需求冲击时, 总供给决策大多倾向于提高产量的数量调整, 而不是进行提高价格的价格调整。二是供给能力过剩导致供给形成容易, 需求则出现了惰性和疲态, 此时, 一些典型的刺激消费政策收效甚微, 如, 几度公务员工资上调是选择了不合适的消费阶层, 这些人的工资增加直接转入了储蓄而不是用于消费; 扩展农村消费市场则是选择了不合适的消费群体, 为一些劣质产品和非应时产品实现歧视性倾销提供了渠道。这也最终促使政策导向上实现了刺激需求向培育需求的转变。三是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形下加强了企业的竞争、资本市场的竞争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这为提高供给行为的质量和效率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也为企业改造、产业结构调整 and 合理区域布局提供了内在动力。总需求不足对总供给的约束和挑拣不仅提高了经济供给效率,

而且也为资源配置提出了硬性约束。

本文认为, 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内, 我国经济增长仍将以第三阶段的特征为主, 同时具有第二阶段的部分属性, 这也使步入“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低碳经济”约束加强、通货膨胀预期加剧等经济环境变化, 迫切要求我们尽快恢复宏观经济调控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 应以调整经济结构和保持稳定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 既要提高“管理需求”的质量和效率, 也要兼顾对供给行为的有效管理, 实现从“刺激需求”到“培育需求”, 再到“管理需求”的转变。^[8] 另外, 由于后金融危机时期影响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产品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波动程度加剧, 因而需要密切关注主要国内外市场的运行态势, 在有效监控国家经济风险的基础上, 采取必要的国家经济风险管理措施, 既要考虑经济政策的短期有效性, 又要兼顾经济政策的长期效应, 积极调整经济政策的期限结构, 尽快恢复经济政策操作的持续性和稳健性。

参考文献:

- [1] 刘树成. 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1).
- [2] 汪同三. 坚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N]. 人民日报, 2006-12-22.
- [3] Zarnowitz V. The Old and the New in U. S. Economic Expansion of the 1990s [R]. NBER Working Paper, 2000, 7721.
- [4] Barro R J, Sala-i-Martin X. Economic Growth [M]. 2nd, MIT Press, 2004.
- [5] Sichel D E. Inventories and the three phases of the business cycle [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1994, 12: 269-277.
- [6] 张守一. 我国经济周期的特殊原因与波动格局分析[J]. 经济研究, 1995, (4).
- [7] Krugman P.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M].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99.
- [8] 蒲晓晔, 赵守国.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结构优化[J]. 求索, 2010, (8).

(责任编辑: 杜 磊)